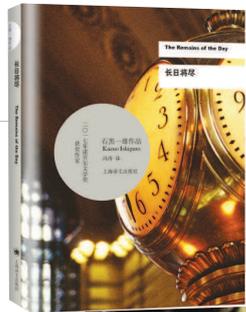


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进退失据

——读石黑一雄《长日将尽》

■ 刘蔚



《长日将尽》

[英]石黑一雄著

冯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同名电影剧照
根据小说改编的



《长日将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荣获1989年度布克奖，由此真正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一流作家的地位。这部小说内涵之丰富、文笔之凝练，也当之无愧地成为石黑一雄重要的代表作。

小说以管家史蒂文斯在新东家法拉戴的资助下，驾车游历英格兰六日为线索，回顾了他在曾经显赫的达林顿勋爵府上服务30余年的种种难以忘怀的经历。史蒂文斯虽为仆人，但志向高远，用《红楼梦》中贾宝玉形容晴雯的话就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在达林顿府成为二战前后英国隐秘的政治与外交“轴心”的辉煌中，他尽忠职守，一丝不苟，堪称完美。但他为了事业刻意压抑自我情感，错过了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面，之后又与爱情失之交臂。在旅行的最后阶段，他与昔日的女管家肯顿小姐相聚，带着重逢的喜悦和难说再见的惆怅，他来到黄昏的码头，坐在长椅上欣赏码头彩灯亮起的活动，也享受着长日将尽的美好与失落。

史蒂文斯的父亲也是一位能干的管家。身为“管二代”，他与父亲最大的区别，是父亲那代管家看重的是主人的门第与封号，史蒂文斯这代管家则更关注雇主的号召力和道义地位，更有理想，更富情怀。史蒂文斯心心念念的是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管家”，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尊严。他认为：“伟大的管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们能够化入他们的职业角色，并且是全身心地化入。”在他眼里，“这世界就是个轮子，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而转动”。如果能服务于一位身处这一轴心、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伟大绅士，那就等于服务于人类，为世界的文明进步

尽了绵薄之力。

史蒂文斯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达到了。他服务了大半生的达林顿勋爵，参加过一战，在战场上与德国人刀枪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但战争结束后，出于绅士的原则和本能，他对已经战败的对手展现出了宽容和友善，“一旦你已经把一个人打倒在地上，就应该到此为止，你就不能再对他拳打脚踢了”。他对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一些严苛限制和制裁德国的条款不以为然。尤其是他在战场上结识的一位德国挚友布雷曼落魄自杀后，痛心疾首之余促使他下定决心运用自己在政界的广泛人脉，开始致力于为德国争取平等的国际权益。1923年，他在自己的府上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非官方的国际会议——集中讨论了《凡尔赛和约》中最为苛刻的几个条款的修订办法。达林顿勋爵的这些做法无可厚非，闪耀出了正义与人道主义的光辉。为了确保会议的成功，史蒂文斯以“一位将军为一场战役做准备的态度”，在

接待与服务上全力以赴。可以说，这场会议的成功既是达林顿勋爵一生中最闪光的时刻，也达到了史蒂文斯孜孜以求的“伟大的管家”职业生涯的顶峰。

然而，纳粹希特勒上台以后，抓住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变成了张牙舞爪的侵略者。达林顿勋爵却没有改变自己的亲德、挺德立场，从而陷入泥潭，执迷不悟，结果被希特勒利用，沦为纳粹的帮凶。1936年二战爆发前夕，他一手策划，安排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与英国首相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达林顿府密会；甚至想促成英王访问德国，与希特勒会谈；短短的三年间，纳粹德国与英国60余位富有影响力的人士建立起了联系，而其中最关键的推动者就是达林顿勋爵。达林顿勋爵奉行的不光彩的亲纳粹政策，令他声名扫地，达林顿府从先前的国际“轴心”，高朋满座，显贵如云，沦为“门前冷落车马稀”，达林顿勋爵也郁郁而终。达林顿府被拍卖给了一位美国人法拉戴。作为达林顿府盛极而衰的亲

历者、见证者，史蒂文斯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可想而知。

《长日将尽》由史蒂文斯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故事，展开回忆和思考。表面上看，史蒂文斯的遣词造句严谨规范，面面俱到而又谨小慎微，颇为吻合他30多年资深管家的身份。然而，在表面滴水不漏的叙述中，底下却是暗流涌动，矛盾重重。史蒂文斯一方面以服务于一位伟大的绅士、成为一名参与人类进步进程的“伟大的管家”为己任；另一方面当达林顿勋爵的教子小卡迪纳尔向他明确指出勋爵的亲纳粹政策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与危害性时，他却选择性地忽视，借口勋爵动机高尚，所作所为是为了维护和平，又辩称他们那种人无法理解世界大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信任“已经认定为明智而又可敬的那位雇主”，为其提供最好的服务，进而体现自己的价值。一方面他对人们批评勋爵是反犹太主义者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奉勋爵的旨意，解雇了府上的两名犹太女仆，私下里也为此感到内疚。一方面，他坚称达林顿勋爵品德高尚，是位伟大的绅士，为自己用一生的黄金岁月为其服务而自豪；另一方面，却在旅行途中与不同的人见面时对自己是否为达林顿勋爵服务过而讳莫如深。史蒂文斯后来不得不承认，回顾往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达林顿勋爵的许多观点，他也觉得“相当奇怪——有时候甚至是令人讨厌了”。

但表面上，他不得不处处维护勋爵的名誉，因为，如果要他公开承认达林顿勋爵是个不完美的、有污点的人，而他自己却是勋爵不光彩的亲纳粹行为的见证者，那他几十年来工作的价值就会受人质疑，他所追求的“伟大的管家”的意义就

会大打折扣，这是他绝对无法面对和承受的残酷现实。

史蒂文斯有理想、有情怀，但缺乏独立的思考和人格，这是造成他在理想与现实、忠诚与自我的矛盾中进退失据的关键所在。不止如此，为了心无旁骛地实现自己成为一名“伟大的管家”的目标，他近乎冷酷地压抑亲情，不解风情，伤害了深爱他的人。

就在1923年达林顿府举行那次国际会议，史蒂文斯全身心投入到会议的接待和服务工作中时，他的父亲却在简陋的小阁楼上陷入病危，奄奄一息，连父亲的临终一面他都顾不上见了，为了成就自己“伟大的管家”的梦想，他付出的牺牲亲情的代价何其惨重。

肯顿小姐在达林顿府工作时，以给他的餐具室送鲜花、执意翻看他的爱情小说等方式表达爱慕之意，都被他冷冷地拒绝了。肯顿小姐终于心灰意冷，远嫁他乡。其实，史蒂文斯内心深处对肯顿小姐又何尝没有美好的情感？他多次回忆起多年前的某个黄昏，他在窗台上与她一起凝视窗外的草地、白杨树和父亲身影的情景；30多年后他接到肯顿小姐的来信，如获至宝，反复阅读，从她信中流露的对达林顿府的眷恋中再三回味。而最终促成他英格兰六日自驾游的一大因素，便是要在旅行途中与肯顿小姐见上一面，希望她重回达林顿府工作，其中也许暗含了他想和肯顿小姐重续前缘的心理动机。然而，这一切都为时晚矣，就像晚霞虽然美丽，但终将随着长日的消失而沉落。

理想的人生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为此而抛弃亲情，牺牲爱情，自我欺骗，则难免蹉跎了岁月，辜负了美景，伤害了真情，对己对人都变成了悲剧。

一本本书构成的人生

——读《出版忆往：陈昕出版随笔集（增订版）》

■ 孙甘露

200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作品系列，并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有幸认识陈昕先生，并聆听他对我写作以及对当代文学的诸多观察和判断。后来我得知，陈昕先生事先嘱咐出版社为他准备了我的作品和相关资料，并为参加会议亲自撰写了发言稿。

这件小事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在此之前，对于上海出版界，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上，对于出版业所知甚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陈昕的文章，也因此注意出版物在它问世的同时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关联。这是那次作品研讨会给我带来的饶有意味的启示。实际上，也因此使得

我从出版以及更多的角度，反观写作，这也是陈昕在多处文章里提到的，如何从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研究、社会生活的迫切要求中发现出版的焦点及重大命题，并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来响应时代的呼唤以及出版传统的接续和发扬。

在我读来，这本文集的重心有二，一是对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陆谷孙、巢峰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生平交往的回忆，同样，这些学术出版、学术研究所形成的交流和思索，无疑是构成陈昕出版生涯极其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在陈昕从事出版工作的前期，与一众年轻学者的交流促进，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一代学子，对中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时期思想领域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敏锐思

考，构架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的探索之道，而经济领域的大量问题，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实际经济活动中都是当时社会思想领域最为急切需要回应的。这是出版人如何主动参与塑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很好的例子。

如同陈昕在《铸就历史的铜镜》一文中论及学者的品格时所说的：大学问家自当具备“通家气象”，学术视野广阔，境界高远。在他的运筹中，“通”者之首义为“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查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通”者必须“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我想，这也可以视为



《出版忆往：陈昕出版随笔集（增订版）》
陈昕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昕在大时代背景下对出版事业追求的自我期许吧。而这也可以视作所有从事与文化相关工作的人所向往的目标和方向。

作为一个在文化单位供职多年的工作者和写作者，读陈昕这些文字平实、内容丰富的文章，经常会有会心的瞬间，感触良多。时移世易，那些不懈工作的时时刻刻，那些殚精竭虑思索的日日夜夜，由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所构成的人生，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的最忠实的答卷。